

对美国比较文学独立学科性质一种新说的质疑

孙景尧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每十年一度的美国比较文学协会的最近报告中提出, 比较文学“学科独立性有赖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性与关系”。文章论证指出, 这是对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的“进一步、退两步”的新说, 论文通过对国际学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反思, 进一步论述了比较文学学科的三要素: 跨界的文学关系——研究对象, 跨界的视野——“知识储备”, 与之“适合”的研究方法——可比性学理逻辑假设, 这三者共同组成了互存互动的既充分又必要的条件, 从而使比较文学成为与众不同的一门文学研究独立学科。

关键词: 比较文学; 研究对象; 学科性质; 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 即什么是比较文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 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理论的更新, 对其拷问与反思就从未间断过。早在比较文学学科诞生不久的1903年, 意大利的克卢齐就著文质疑“什么是比较文学?”^{[1](P219)}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的1958年, 美国的韦勒克也说“比较文学仍然是一个引起争论不休的学科和理念。”^{[2](P1)} 直到1993年, 英国的苏珊·波斯乃特仍说, 学者早晚都不可回避要回答“什么是比较文学?”^{[3](P1)} 但到了2004年, 每十年一度的美国比较文学协会的新报告里, 该报告的撰写者、斯坦福大学的苏源熙则变换了拷问: “比较文学的对象是什么?”^{[4](P12)} 从“比较文学是什么”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什么”, 对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的新说是前进了一步, 还是后退了? 我们究竟怎样认识比较文学这门独立的文学研究学科? 看来仍是一个须再反思与认知的学科基本问题。

一、“进一步、退两步”的新说

苏源熙说: “比较文学专与(对象的)特性和关系打交道: 关注对象的特性并由此超越各种既定的话语模式和新解读方式在对象间创建的各种关系。”^{[4](P25-26)} 其所说的比较文学对象的“特性和关系”, 尽管启用了当今通行的新术语及其表述方式, 但其对研究对象的认定, 同先前的认识并无二致。例如, 基亚和雷马克——两位足以代表“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如果可以这么划分的话)的比较文学家——他们针对“比较文学是什么”的回答, 就说到了“特性和关系”。前者说“是国际文学关系史”^{[5](P5)}, 后者说“是超越一个特定国家界限的文学研究”和“文学为一方与别方的知识、信仰领域为另一方的关系研究”。^{[5](P5)}

基亚对其所主张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的内

收稿日期: 2006-11-20

作者简介: 孙景尧(1943-), 男, 上海嘉定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容,亦即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作了如下的阐释:“两种或几种文学之间在题材、观念、作品或情感的众多交流。”^{[5](P5)}而雷马克的定义所指的研究对象,其范围更广。因为超越一国的“文学研究”,就涵盖了有交流、无交流的所有一国以上的文学对象了;非但如此,其所要求的关系研究,还扩展到了文学与其他的知识与信仰领域。对此,1976年,他在布达佩斯第八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讲演中说得非常详细:“首先,它通过对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体系和语言体系的具体作家、作品、文类、潮流、运动、时期的比较分析与综合,将文学结构的一般原理明确展现或作批评。”“其次,比较文学通过类比、对照和因果关系的研究,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体系中的历史时期、文学运动、文学潮流、流派、主体和文化特征作归纳性的总和。”“第三,通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不一定有因果关系的作品和论著所进行的精心的平行研究,以加深人们对这些作品的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理解。”“第四,比较文学要研究被韦勒克称之为某些作品的‘外贸关系’……这类工作基本上是历史性的、独立的一部分。”“第五,比较文学旨在对上述四方面内的一切进行跨学科研究。”^{[6](P109-110)}可见,他们在回答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是什么的同时,都强调了跨越语言、民族、国家、学科和文化等界限的文学关系及其特性。

不过,苏源熙同基亚、雷马克不同的是,他还断言“本学科在学术体制内的独立性也有赖于此”。^{[4](P26)}努力探讨比较文学学科的“独立性”,是无可非议也是大家孜孜以求的,就此而言,苏氏的新说可算“进一步”了。尤其在面临“大讲理论、大讲跨学科的多媒体文化研究时,比较文学也就有丧失自己本身特性的危险”^{[7](P4)},于是提出“重新考察‘文学性’观念,以新的视角重返具有新意和新见解的文学研究”^{[7](P5)},这无疑是反思美国比较文学现状的一大收获与进步。但平心而论这只是对理论大潮和泛文化研究等侵袭学科的“拨乱反正”。而恰恰在此,他的新说又“退两步”了。

其一,如果仅以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为准,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必标上“比较文学”印记的文学史或文艺学研究等,也可以论及“超越各种既定的话语模式”的研究对象,也会作“新解读

方式在对象间创建的各种关系”,因此仅以此为准,依然重又回到以往拷问的起点,因为,人们完全可以比较地拷问:国别文学、文艺学或其他文学研究的对象,难道就一无跨越界限之处吗?同样,其他的比较研究学科,如比较文化、比较宗教学、文艺心理学,乃至“区域研究”等,其都跨越界限自不待言,难道它们就同文学完全绝缘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皮瓦克指出:“一门从事区域研究的学科和那些社会科学的学科,它们总是企图借助小说的力量。”^{[8](P49)}

诚然,研究对象的认定,对许多学科都可视为其基本事实的定性问题,如研究昆虫的昆虫学,研究水稻的水稻学,它们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专有的,并构成其与众不同的基本事实与内容,也因此决定了其为一门学科。然而,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即文学作品、文学家、文学思潮、文学史、文论、文学批评、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等,在我国现行学术建制中(也包括美国等),它们都分别有文艺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或国别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或者其他学科作其研究对象或部分的研究对象,即使是跨学科的文学与心理、宗教、文化等关系,则也有文艺心理学等的学科在研究。所以,从逻辑上看,只谈其研究对象,那么比较文学同其他文学学科,以及其他比较研究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交叉关系,而非全异关系或排斥关系。所以,一味依赖其研究对象来决定我们的学科性质,在“认识论”上,恐怕其研究的性质范围和前提条件及其所要求的一般可靠性,尚难与其他文学研究和比较研究学科区分明确,也难以获得其特有的性质与独立的身份。也就是说,只有其研究对象,既与其他文学研究,又与其他比较学科有所区别,它方能是必要的并又是充分的条件。

其二,基亚、雷马克等所强调的比较学者必备的跨越语言、民族、学科、文化等界限的特有“知识装备”,苏氏新说又比之后退了一大步,而这又恰恰是比较文学独立并特有的“特性”和要求。

半个世纪前,法国比较文学家基亚就指出,“比较文学者站在语言和民族的边缘,审视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众多交流。他的工作方法就要与其研究内容的多样性相适合。必要的装备,对他是必不可少的。

他必须知晓几种文学,他必须会读几种语言,他必须知道如何找到必不可少的书目索引。”^{[9](P5)}定义中的“站在语言和民族的边缘”和“审视两个或几个文学中题材、观念、作品或情感的交流”,无不都是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跨界视野”特点;而所提出的“工作方法”和必要“装备”,也正是基于其“跨界视野”而与“研究内容”“相适合”的必备条件。同样,雷马克的定义也是如此,正因为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辅助学科,是连贯各片较小的地区性文学的环节,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联结起来的桥梁。”^{[10](P8)}而且还有“比较文学学子必不可少去找到”^{[10](Pvii)}的专业书目,因而论文集的编者极有眼光地将其论文收为首篇,并冠其书名为“比较文学:方法和视野”^{[10](Pvii)}。

事实上,“比较文学研究对象”同“比较文学”并不相等,前者只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部分(种)概念,后者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总(属)概念。苏氏新说的“退两步”,其退就退在以前者置换了后者,少掉了“比较文学:方法和视野”。而这又恰恰是至关重要的比较文学对象的特性和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

对视野,不少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倒相当清晰并从未忽视。现任教于复旦大学的杨乃乔教授就认为,是“比较视域”(perspective,亦即视野)“构成比较文学研究安身立命的基点——本体”^{[11](P106)},并引用哥伦比亚大学已故比较文学教授赛义德的话:“比较文学的构成及其初衷是为了获取一种超越自己民族的视域(perspective),把眼光投向整体而非本民族文化、文学和历史抱残守缺的那一点点东西。”^{[11](P106)}这从比较文学学科形成的缘由上,揭示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与众不同的特点和性质。当然,人们还可再拷问:比较文学是本体论学科?还是认识论或方法论学科?或者三者都是,也许还会有别的答案,但将“视野”认作比较文学学科的“安身立命的基点”,则是说到了关键之一,也正是这一基点,使其不仅研究对象须“跨界”,包括苏源熙讲的“专与(对象的)特性和关系打交道”,而且其研究方法和“知识装备”也随之要求与之“相适合”。

因为,跨界视野,就是指落实为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具备的跨界“知识装备”,即至少如基亚所说

“他必须知晓几种文学,他必须会读几种语言,他必须知道如何找到必不可少的书目索引”,循此也才真正能进行与众不同的比较文学研究。陈寅恪、钱钟书身体力行的融通或循环研究,就因为他们学贯中西、博通古今,他们的论著不必标上比较文学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否则就是标上比较文学也未必就是比较文学研究。对此,我们不必展开更多的论说,因为具有跨界的“知识装备”,则就拥有了研究跨界文学关系的“权力”或叫“力量”,如培根早就说过的:“知识就是力量。”

其实,无论是“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或是当今的比较文学学者,其对视野及其知识装备的要求,是从不含糊的。早先的法国影响研究,是旨在研究“国际文学的关系史”^{[13](P4)},提格亨说:“一个国家的文学史家要把他的研究延长并推广到其他各国文学中,去发现或追求他所研究的作品地连续和归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不得不去求教于那些学识超于他所知以外的专家们。……那些专家就是比较文学史家。”^{[13](P43)}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雷马克也同样如此:“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与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不仅从地理方面,而且从不同领域的方面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10](P8)}直到20世纪末,仍然如此。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就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3](P1)}突出了跨越“文化”和“时空”以及“文学相关模式”的特点。应当指出,即使苏源熙本人也认识到跨越界限的必要性,他说:“比较文学需要突破这些限制,时时记住它承诺要抛弃的民族、国家界限并不仅仅是在一片相连的土地上随意划出的线条。”^{[7](P16)}

然而,苏源熙的新说,仍然不如他同辈反思得深刻,也不如他前辈认知得正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皮瓦克,不仅强调:“比较文学必须总是跨越界限。”^{[8](P16)}而且她还尖锐批评:“至今比较文学仍是欧美文化主导的一部分。”^{[8](P25)}因而她极力主张应“跨学科”界限,并尤其要跨越西方对他者“想象物”的局限。^{[8](P92)}而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会长的达姆罗施,则明确地将之与知识装

备相连并指出:“难道比较文学家注定难有作为:在本土研究上,我们的知识装备比不上国内文学研究专家,而面对着文学研究的全球化扩展,越来越超出自己的把握”,而这个就是“担心自己难有作为成了当今比较文学的心病。”^{[14](P25)}

美国老一代比较文学家雷马克,在2002年著文强调:“从不同的文化视野比较研究整个文学作品,大体上是比较文学的关键。”^[15]在此,毕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雷马克,他将跨越“文化视野比较研究”定格为“比较文学的关键”,可谓“睿智卓见”。

因此,跨界视野及其知识装备,既是比较文学对象的特性,也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特有要求和必备条件,也就理所当然使之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之一。

二、再反思与认知“可比性”

应当看到,“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同“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特点是什么”,也是不相等的。前者是拷问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即其内容的外延,后者是拷问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特质,即其研究的内涵。因此,弄清楚比较文学“比较”的研究特质,是认识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的又一重要问题。对此,已故的前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会长、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迈纳认为,应明确:“正确的比较以什么为基础?什么样的规律支配着现有材料而作为比较的标志?”^{[16](P220)}同时,他对美国比较文学界多少有些忽视这一问题,不无伤感地说过:“令人失望的是,比较学者们完成的研究课题很少进行真正的比较。我们未能在这门学科的诞生之初研究比较的规则则更是一件奇闻。”^{[16](P222)}

不过,法国的比较文学家倒与此相反。前有著名的比较文学家艾琼伯说:“和我一样,雷内·韦勒克没有忘记,在‘比较文学’中有‘比较’一词,但和我一样,他也相信,另一个词‘文学’是不应被忘记的。”^{[17](P107)}今有索尔邦大学的谢菲尔肯定地认为:“我们是主张比较文学有其所属的特定方法论的。”^{[18](P3)}

应该看到,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同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的普遍性是,研究者的学理假

设或认识论述,是不能证伪、也不能作纯客观检验的。这是由人文学科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及比较文学研究“特定的方法论”所决定的。

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客体。如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水,无论是大江大河的水,还是山溪池塘的水,都是由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组成,其中既不包含人的主观意识,也不顾及科学家的好恶情感。但文学作品中所写的水,却是饱含着作者主观意识与情感在内,而且还要求独辟蹊径。李白《将进酒》的首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可谓豪情满怀、汹涌澎湃。而他的《渡荆门送别》中的“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则又是“辞别远游”的恋怜之情了。凝眸在文学中的作者主观思想感情,甚至可以更改客观已知的科学认识,而为主观意识或传统认识所左右。中国传统文学描写男女相爱总比之以鸳鸯,因为雌雄鸳鸯一旦丧其伴侣,存活下来的要不了几天就随之死去,以此喻示情侣的难舍难分。但事实上,科学告诉我们,生物界雌雄动物难舍难分到须臾不能分离的“冠军”是血吸虫而非鸳鸯。然而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还是读者的接受,都仍然以鸳鸯作比,而绝不会去说两人相亲相爱得就像血吸虫一般。至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审美感受,则更能说明这点。中国视孔雀为美,用来赞美女子是褒奖有加;但法国说某女子是孔雀,则有“淫荡女人”之嫌。可见,文学不像自然对象那样“纯客观”,也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给人的是关于客体存在的客观知识;而文学给人的是思想情感的主观体悟和社会人生的内涵认知,钱穆称之为“内涵真理”。

与此同时,就研究者的必备学理假设而言,自然科学与文学研究也是大不相同的。自然科学的假设和理论,是可以被检验、被证伪的。大家熟知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德两国研制原子弹一成一败就是一个例子。两国科学家的假设和理论都一致,都用石磨做反应堆的实验:美国做成了,并进而制造出了原子弹。而德国未做成,当时不知其用的石磨是被人掺杂做了“手脚”的,反倒因实验失败而放弃了其理论和假设,最终使原子弹研制计划流产了。

但文学研究其同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的是,文学研究者不仅不排除其主观意识,而且,学者们总是依据已有的文学知识、理论认识和前人文献等,作为其研究文学的学理假设依据并要求“避免老生常谈”^{[4](P14)},进而作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分析论述,以证明自己的“一家之说”,给文学认识的王国增添“新的版图”。一部《诗经》,总共只有305首诗,其中的“国风”才160篇。可是两千多年来,研究它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其开首的《关雎》一诗,是只有短短80个字写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但历朝历代的研究者,从其封建教化的主观意识出发,将其与历史配合,寻求伦理认识。西汉时有说是王教之端,有说是刺时之作,较后的毛郑之学,则说它是“后妃之德也”。直到宋代的经学大师朱熹,尽管他认为《诗经》中的国风160篇,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但他仍然说《关雎》是“此纲纪之首,王化之端也”。同样,欧洲对《圣经·雅歌》的研究认识也是如此。明明是一首热烈肉感的以色列情歌,但从犹太拉比们开始,从其宗教信仰的主观意识出发,将其说成是神圣的启示,是“圣中之圣”;后来神学家的研究阐释,更是将其说成是预表基督教徒对耶稣关系的认识,一次又一次地将其神圣化为最具奥秘隽永真理的说教。

比较文学也同样需要学理假设,从提格亨到谢菲尔都强调:“正如在许多别的学问中一样,对于比较文学家的工作,假设往往是必要的。”^{[13](P60)}“比较文学乃是治学方法,是检验众多假设和研究文本之道。”^{[18](P6)}但与一般文学研究假设所不同的是,比较文学是将跨语言界、跨国界、跨文化界和跨学科界的文学关系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随之也必须具世界文学和总体知识视野(作为个人未必能行,但作为学科理当如此)的预设理念和视角标准等,从而成为其研究的特定学理假设内容,使之“自觉自由”地进行多种文学或多门学科及文化的相互参照和研究探索。

正因此,比较文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对比较文学特定研究方法的探究,也就被比较文学家一提再提并一论再论。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提格亨就论述道:“总之,‘比较’一词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以使比较文学具有“历史科学的特

质”^{[13](P17)}。美国比较文学耆宿雷马克,二战之后,在其《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中,也具体阐述了如何解决跨学科比较研究的“难以确定”的“比较性”。^{[19](P6)}而迈讷则早在1980年代首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就明确提出“‘比较’的含义是什么”并进而发问“‘可比性’的界限(或原则)究竟在哪里”。^[20]到了1989年,他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一文中,强调指出:“今后,凡是从事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们必须掌握可比性的原则,这是基本的知识。”^{[16](P222)}同样,法国的谢菲尔认为:“方法是‘前人之道’。无论如何,比较研究依据的是基于方法论的理念”,这理念就是“文学的比较科学”。^{[18](P74,P1)}从“比较”的“科学涵义”和“特质”,到“比较性”、“可比性”,充分反映了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研究特有方法论的探索和共识,并不断总结和积累为比较研究可比性的学理逻辑假设依据。

以通常所说的“影响研究”可比性为例,一开始它就如第根亨所说:“对于用不相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或异点的考察,只是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他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作品的出发点而已。”^{[13](P17)}后来的比较学者发现,仅有影响还不足以完成文学交往的全部“事实联系”。如迈讷所说:“通常所说的‘影响’意味着甲把某种东西送给乙,而实际上谈论接受更准确一些,乙选择来自甲的某种东西。”^{[16](P208)}至20世纪末,谢菲尔将之总结为:“接受研究与影响研究两者互补,后者需要前者。”以及“促成文化转换”必不可少的“传播媒介”。^{[18](P31)}因此,比较文学对国际文学交往关系研究的可比性,就落在影响类型、接受方式和传播媒介途径上。国际文学之间的关系,直接也罢,还是经由其他学科的间接也罢,总是在正、负、反等矢量方向上,或是在影响的性质和程度方面等等,组成各种文学史的同源性的“事实联系”之“网”。正因此,迈讷说“首先要提出的一种同源关系”,并应对此作“深入探讨、发掘关于同源关系的主要原则。”^[20]依此研究之道,方能如谢菲尔所总结的:“比较文学者总是面对深奥的他者文化,不管自己是否喜欢或是否属于同一文化,但经过其细致的研究审视,则拥有更多地认识

对方作品的理由,并最后更好地认识自己。”^{[16](P2)}

后起的美国学派对“可比性”的认识,也同样如此。雷马克举例阐释道:“只有把史学与文学作为研究的两极,只有对历史事实或记载及其在文学上的应用进行比较和评价,只有在合理地作出了适用于文学和历史这两种领域的结论之后,才算是‘比较文学’。讨论金钱在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作用,只有当它主要探讨一种明确的金融体系或思想意识如何渗进文学作品中时,才具有比较性。探讨霍桑或麦尔维尔的伦理或宗教观念,只有涉及某种有组织的宗教运动(如伽尔文教派)或一套信仰时,才可视为比较性的。”前不久又说:“跨学科、跨国界和近来跨文化研究的前提是一致的:那就是寻找、分析和总结彼此的差异、姻亲关系和相互影响。”^[15]因此,其研究的可比性就落在理性的“功能标准”上。同样,也如钱钟书所说的,去研究获得“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打通”“文学文心”^[21]的规律认识。

可见,比较文学可比性,是基于跨语言界、跨国界和跨学科界的研究对象和视野知识,又服务于学科宗旨及其任务的学理逻辑假设,是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并愈益有效的,也是比较文学的比较之所以使学科名实相符的特定研究之道。

总之,跨界的文学关系——研究对象,跨界的视野——“知识装备”,与之“适合”的研究方法——可比性学理逻辑假设,这三个组成了密不可分的互存互动的既充分又必要的条件,从而使比较文学成为与众不同的独立文学研究学科。在此,再重温艾琼伯教授——这位“欧洲汉学第一人”和著名比较文学家的名言,是有益于我们再反思和再认知的:“和我一样,雷内·韦勒克没有忘记,在‘比较文学’中有‘比较’一词,但和我一样,他也相信,另一个词‘文学’是不应被忘记的。”^{[17](P107)}

参考文献:

[1] H. J. Schulz & P. H. Rhe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Early*

Years [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3.

- [2] Rene Wellek. *Discriminations: 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3]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Blackwell, 1993.
- [4] 苏源熙. 关于比较文学的对象与方法(上)[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 (3).
- [5] Robert J. Clemen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cademic Discipline: A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Praxis, Standards* [M].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78.
- [6] 孙景尧. 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M].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87.
- [7] 张隆溪. 从外部来思考[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 (3).
- [8] Gayatri C. 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 [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9] Robert J. Clemen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cademic Discipline: A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Praxis, Standards* [M]. New York: M. L. A., 1978.
- [10] Henry H. H. Rema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M]. in Newton P. Stallknecht and Horst Frensdorf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3.
- [11] 杨乃乔. 比较文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2] 基亚. 比较文学[M]. 颜保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 [13] 提格亨. 比较文学论[M]. 戴望舒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
- [14] 达姆罗施. 比较文学的问题与选择[J]. 中国比较文学, 2003, (4).
- [15] Henry H. H. Remak.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t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Neohelicon XXIX (2002)1.
- [16] 昂热诺,福克马. 问题与观点[M]. 史忠义等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 [17] 于永昌,等. 比较文学译文集[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18] Yves Chevre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M].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Farida Elizabeth Dahab, Kirksville: The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9] 北师大比较文学研究组. 比较文学研究资料[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 迈纳. 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问题[A]. 中国比较文学[C].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
- [21] 郑朝宗. 《管锥编》作者的自白[N]. 人民日报, 1987-03-16.

(下转第81页)

- [17] 王西彦. 读《上海的早晨》[N]. 文艺报, 1959, (13).
[18] 张炯, 邓绍基, 樊骏. 中华文学通史(12) [M]. 当代文学编·小说戏剧[M].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7.
[19] 虞留德. 他倾尽心血创造《上海滩的春天》[A]. 现代戏剧家熊佛西[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5.
[20] 冈本隆. 《上海的早晨》第一部日文译本前言[A].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周而复研究专集[Z].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内刊本), 1979.
[21] 张政, 德超. 《上海的早晨》越南文译本序[A].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周而复研究专集[Z]. 上海: 上海师大中文系(内刊本), 1979.
[22] 边风豪, 包裕成. 号子嘹亮[J]. 朝霞, 1974, (3).

A Discussion of Account and Narration of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Shanghai City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50 to 1970

ZHANG Hongsheng

(Faculty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5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ccounts or narrations of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Shanghai City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50 to 1970. New Shanghai broke up its relations with the old Chinese port city, but it kept the industrialization logic of its image pedigree, which was so strengthened and extended as to posses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whole country.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understanding of Shanghai; one was concerned with its blood relationship, i. e. stress upon its socialist left-wing characteristic; the other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break-up viewpoint, i. e. view of Shanghai as a city which broke up its capitalism so that the city's industrialization might be endowed with ideological legality. Only thus, was Shanghai enabled to be in possession of the national features of New China that were of so great significance as to be populariz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Key words: Shanghai, industrialization, identity of Shanghai City, literature of new China

(责任编辑:吴晓明)

(上接第87页)

Query to a New Statement of Defining the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n Individual Discipline

SUN Jiny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 recent report of the decenni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rgues that "the independe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depends on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interrelation" of its dimens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tend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new argument means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ward" in defining the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Reflecting on the theories advocated by our partisans,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three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discipline: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relations as its dimens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s its equipment and logical hypothesis of comparability as its proper approach. These three elements, which coexist and interact, jointly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the discipline, thus enabl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become a distinctive independent discipline.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imensions, character of discipline, proper approach

(责任编辑:吴晓明)